

海外学子寻访革命前辈的红色足迹



上图及右图：如今的哥廷根大学。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新华社记者单宇琦摄



第二站：德国哥廷根

朱德元帅曾留学的哥廷根大学

徐美德

哥廷根大学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南部，是德国著名的大学城之一。上世纪20年代，为了寻找新的救国道路，朱德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那里留下了革命足迹。

探寻革命足迹

1922年10月，朱德抵达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德国。他先在柏林落脚，在这里结识了先期抵达欧洲、当时正在柏林进行革命活动的周恩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5月4日，朱德抵达哥廷根，开始求学生活，初到时住在文德·朗特路88号，后迁至普朗克街3号。

如今，在当时朱德居住过的地方，即普朗克街3号，可以看到一座红砖砌成的德国老式楼房，墙面上嵌有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匾，上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等字样。

1986年，朱德100周年诞辰之际，哥廷根市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时任市长亲自为纪念牌匾揭幕。

朱德在哥廷根大学求学的故事，对一代代就读于该校的中国学子来说，十分熟悉。学校图书馆内至今仍保留着朱德的注册簿，在哥廷根市档案馆，也有一张当时朱德进行居民登记的登记卡。

据档案记载，朱德在学业之外组织、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根据相关档案，曾记载哥廷根中国学生会向警方提出游行并散发传单的申请，传单的题目叫《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介绍了“五卅惨案”及其发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阐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意义。在德期间，朱德由于参加声援“五卅惨案”后上海罢工等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捕。1925年，因形势变化，他被迫离开德国。

哥廷根档案馆前馆长海尔格·玛丽亚·库恩在《哥廷根的中国人》一文中指出，朱德在德留学期间更多地致力于与中国同胞进行政治和军事话题的讨论。

有时候，当地人也会把周恩来和朱德搞混。笔者刚到哥廷根的那年冬天，由于找兼职，碰到了林学系的一位教授，答应这位教授在圣诞节期间给他扫雪。但是圣诞节过后，哥廷根并没有下雪。和这位教授再次碰面闲聊时，他说起了周恩来当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的情况，笔者纠正说，应该是朱德。

走进古老大学

在哥廷根大学中国学联的网页上，至今还可以看到朱德留学情况的简介。距朱德在哥廷根大学留学已逾90多年，如今到该校留学的中国学子越

来越多。
回望历史，哥廷根大学在2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最为世人熟知的有格林童话的编纂者格林兄弟、诗人海涅、“铁血宰相”俾斯麦等，可谓灿若星辰、名人辈出。

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哥廷根大学有幸避免了老城被轰炸的厄运，与德国很多城市在废墟之后的重建相比，哥廷根的很多古老建筑完好无损。这不仅是建筑学者的莫大福音，也是莘莘学子的福分。

说到哥廷根大学的成就，在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先后有4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德语区大学名列前茅。该校基本上集中了当时一流的学者，如马克斯·普朗克、高斯、黎曼、大卫·希尔伯特等。

今日的理科校区在中央校区的西北方，包括物理学院、化学学院等。不过老的数学系、物理学系在市政厅的外环，与高斯、韦伯雕像隔街相望。

除了理科被人熟知之外，哥廷根大学在文科方面也卓有建树，除了常规的学院以外，还有诸多被大家认为并不“热门”的系所，它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人文学院”，如埃及学、科普特学，以亚述学为代表的古代东方学、印度学、伊朗学等。这些“冷门”系所，将其作为本科第一专业来学习的学生寥寥无几，导致有时候会出现一堂课就两三个学生的情况。有时候因为这些原因，部分专业在教师教授退休之后，会被大学关闭。

除了朱德之外，1935年至1945年，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和研究10年之久，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在专业学术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历史和现实融汇

由于哥廷根是一个大学城，在整个城市都分布有哥廷根大学的各个系。老图书馆在老市政厅旁边不远，新的大学及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则在新的校园集中区。从图书馆进去是一个大的广场，先后被神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及中央食堂环绕。隔了一条街的位置，就是德语系、哲学系等系所在地。再隔一条街，是印度学系、土耳其及中亚学系等所在地以及旁边的意大利食堂。

2010年10月，笔者抵达哥廷根大学这座学术圣城，一开始攻读的是印度学与古希腊语学本科学位，学习压力极大，如梵语班上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古希腊语拉丁语课上除了笔者，当时还有一位学习哲学的日本学生。不过各位老师会照顾外国学生，如在印度学系上印度学导论课，任课教师会特意把讲稿发给我们进行期末复习。系里的氛围极好，每天早上，福尔那老师都会到每个办公室向大家问早。下午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则



哥廷根大学礼堂。 徐美德摄



如今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

经常在系里小厨房一起喝咖啡、吃蛋糕。大学城除了师生，也有很多饱受科学之光眷顾的市民，他们经常与学子一起出入大学课堂、看电影，享受剧院等文化设施。

哥廷根老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上有一个著名的“牧鹅女”铜像，广场周围是各种酒吧、饭店、服装店，每到下午，就有很多人在露天喝咖啡、啤酒。到了周六，更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每年的圣诞市场也是游人如织。

在格林兄弟的笔下，“牧鹅女”是一位公主，被女巫做法后，被迫去牧鹅，后来历经各种苦难，终于与王子相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有此美好的寓意在，故哥廷根有一个传统，即每年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准博士们可以坐着花车，由亲友敲锣打鼓拉到广场，然后“当事人”献上系里事先准备好的鲜花，在师友的注目及旁边的奏乐声中亲吻“牧鹅女”。笔者有幸在导师的陪同下亲历一次，至今思之，恍如昨日。

（作者系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



上图：哥廷根普朗克街3号朱德故居，墙上挂着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匾，上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等字样。

左图：哥廷根普朗克街3号朱德故居外景。

美食为媒
架起沟通之桥

岳雨薇

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在异国他乡读书，吃上一顿地道的家乡美食可谓最惬意的事。所谓游子离家思乡愁，浓浓的故乡风味正可缓解一二。中国留学生一边各显神通慰藉自己的中国胃，一边在适应当地饮食习惯的同时，将中国食物介绍给当地的同学、朋友，搭起饮食文化交流的桥梁。

艰辛的大厨之路

因吃不惯当地食物，加上国外的中餐价格太高，很多中国留学生都会选择自己做饭。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读本科的朱文琦在出国留学之前基本没有做过饭，最多就是煮面条。而到吉隆坡读书后，朱文琦的做饭手艺日益精进，成了连卤味都不在话下的“超级大厨”。“成为大厨的过程是不易的，我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朱文琦坦言。

朱文琦告诉记者，她遇到的挑战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首先是调料的选择：要做地道的中餐，有些调料需要到中国超市购买；其次是食材的选择：有些中餐需要的配菜比较难找，价格也比本地蔬菜高；最后是厨艺在短时间内难以突破：看着菜谱觉得会了，手的操作却赶不上。“尤其是火候和调料剂量，太不好掌握了，比如，‘适量’是什么量？多大的火算是小火？”朱文琦说。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就读的棣明珠在解决一日三餐时也遇到了困难。刚出国时，棣明珠蒸米饭，都不知道放多少水，还是一位同学教给她如何用手指测量水的深度，水应该高过米多少，才慢慢掌握。对她来说，切菜就更难了，不仅姿势不标准，速度、精细度等都跟不上。以至于放假回国，在妈妈的指导下练习刀工成了棣明珠的假期必修课。

饮食习惯相互影响

虽然“中国胃”很难改变，但出国读书一段时间，中国留学生们也在慢慢接受当地的饮食习惯。

就读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王美晨刚开始觉得适应不了当地多油炸、少调料、烹饪方法相对单一的食物，也不喜欢喝咖啡和热巧克力。“现实是，你找不到别的喜欢喝的饮料，比如国内走几步就有的奶茶店，当地就没有。”但让王美晨没想到的是，读了1年的研究生之后，自己的饮食习惯也在慢慢改变，“如今，我每天都会喝一杯咖啡。”

和王美晨一样，朱文琦也被马来西亚的饮食习惯所影响，开始喜欢喝糖水、吃早茶。

“在美国待了4年，我觉得不能简单描述为接受了当地的饮食习惯，而是家乡饮食习惯和当地饮食习惯相互影响、逐渐融合的过程。”棣明珠说，比如自己主动去了解美国食物的制作过程，也在尝试一些之前没用过的调味品。在这个过程中，她觉得自己的饮食习惯也在渐渐发生变化。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美食除了让自己的味蕾得到享受之外，还拉近了和当地朋友之间的距离。

棣明珠会和美国同学分享中国的小零食，也会邀请他们在自己的住处聚餐，亲手做一桌中国菜。“大家都非常喜欢中国菜，也对中国菜背后的文化很感兴趣，一顿饭下来，彼此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

在笔者采访的几位中国学子看来，邀请外国同学吃中国菜是不同文化碰撞的过程。他们认为，饮食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中国留学生可以通过饮食，架起文化沟通桥梁。

“我在给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及朋友介绍中国菜时，他们也会跟我讲一些自己家乡的食物，比如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同学曾带我吃寿司，并介绍其做法。”王美晨说。

据几位中国学子介绍，除了学生间的美食交流之外，就读学校也会举办一些以食物为媒介的文化交流活动。棣明珠所在大学的中国大学生协会，在中秋节等一些中国传统节日，会举办相应的活动，准备中国食物供大家品尝，反响很好。



棣明珠（右三）和同学及朋友一起聚餐。